

■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专题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3.01.003

# 新时代高校内涵式发展的 多元协同体系研究



袁爱媛<sup>1,2</sup>, 伍林生<sup>2</sup>, 刘宴兵<sup>3</sup>

(1. 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 武汉 430074; 2. 重庆医科大学 医学人文研究中心, 重庆 400016;  
3.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 400020)

**摘要:**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龙头板块,处于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结合点,其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大使命,也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和现实需要,它随着时代发展格局的不断变化而迭代更新、丰富内容、改进方法、提升效率。思考如何构建新时代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创新体系,既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时代所需、实践所需,也是高等教育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应然逻辑。创新体系能够推动基于价值理性的教育现代化,满足进一步激发高校内外部治理体系动力的具体要求。“协同”是一个整合性概念,有助于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创新体系构建,协同的思维与高校事业发展的融合有助于发挥信息交汇、控制和反馈的积极作用。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协同体系的思想根基,以打破资源、信息、环境和组织之间的各种边界和壁垒为出发点,形成高校内涵式发展多元协同的演化生态,构建以提升高校内部协同效应和外部协同效应为路径的发展模式,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创新和改革实践参考。

**关键词:**高校治理;高质量发展;高校内涵式发展;多元协同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3)01002613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龙头板块,处于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结合点,其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年毕业人数已居世界首位,但

修回日期:20221202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高等教育思政专项“课程思政育人体系研究与实践”(201014S)

作者简介:袁爱媛,女,四川自贡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重庆医科大学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伍林生,男,湖南耒阳人,重庆医科大学医学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刘宴兵,男,四川遂宁人,重庆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和网络安全管理研究。

引用格式:袁爱媛,伍林生,刘宴兵.新时代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多元协同体系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23,11(1):2638.

Citation format:YUAN Aiyuan,WU Linseng,LIU Yanbing. Research on the multi-collaborative system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23,11(1):2638.

规模扩张并不意味着质量提升和效益增长,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sup>[1]</sup>。这一重要论断具有高远的历史站位和深邃的战略眼光,统筹“两个大局”的深刻变化,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实践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21世纪将是一个更加注重质量的时代<sup>[2]</sup>。高等教育追求高质量发展,对新时代高校内涵式发展赋予新的要求,创造新的条件,提出新的课题。高等教育系统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在层次、类型和区域方面实现协同、均衡和公平发展<sup>[3]</sup>。基于此,高校内涵式发展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格局的不断变化,更新观念,丰富内容,改进方法,提升效率。构建新时代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创新体系,既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时代所需、实践所需,也是遵循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应然逻辑,进而推动基于价值理性的教育现代化,满足进一步激发高校内外部治理体系动力的具体要求。

## 一、新时代高校内涵式发展的价值意蕴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先后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从“推动”到“实现”再到“加快建设体系”,彰显党中央把内涵式发展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方向的战略定力。内涵式发展成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和现实需要。

### (一)政策变迁:从规模到质量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发展方式、转型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支撑经济发展转型的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内容、方式以及发展路径也随之发生变革。这样的变革,其核心是从传统的规模扩张到质量和效益的提升。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所言,增长与发展二者之间有密切联系,但不完全相同,单纯的增长并不足以实现发展<sup>[4]</sup>。众所周知,近二十年来,受到国家发展政策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战略到科教兴国战略选择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政策导向也经历了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发展转变,主要表现为,从注重规模和数量的集约型增长到注重质量和公平的效率至上。1999年,面对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增长与高等教育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立足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需求,国家作出关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重大决策,并迅速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努力增强高校创新与服务能力”。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至此,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和核心。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以普通高等学校校均规模和生师比为例,1999年,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408.6万人;2004年招生447.3万人,在校生1333.5万人;2008年招生607.7万人,在校生2021.0万人;2017年招生761.5万人,在校生2753.6万人;2020年招生967.5万人,在校生3285.3万人。1999年,在校普通本专科学生与专任教师比例为9.6:1,到2020年,生师比达17.9:1。在招生数量增长的同时,相关教育资源并未相应增加,这就导致生均拥有的高等教育资源出现锐减趋势。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在外延式快速发展之时,应更加重视内涵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党和国家要更加主动发挥教育强国建设在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主体性和战略性作用,更加主动地统筹教育力量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将进入全面提质增效、创新发展的新时代,也将迈入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教育体系的发展,要明确教育体系发展的方向,以及各级各类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点<sup>[5]</sup>。“高质量”在本质上是一个关于质量的概念,“高”是对水平、层次、效率、作用和贡献等方

面的要求。从高等教育的功能来看,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活动的更高水平、更高效率、更大贡献的要求。高校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不移地以内部核心能力建设为着力点,科学准确定位高校发展目标、特色与优势,聚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的重大使命,以打造核心竞争力引领学校综合实力提升,以提升综合实力的视野布局核心竞争力建设,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标准尺度,贯穿高校发展的全方位、全领域、全环节。

## (二)价值追求:从外延到内涵

从发展方式来看,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以增加或充实内涵的方式发展高等教育,或以加强或重视内涵建设的方式发展高等教育的缩略语<sup>[6]</sup>。从发展模式与价值选择来看,我国的高等教育自古至今都具有十分强烈的工具性取向,主要体现在外部与内部两方面<sup>[7]</sup>。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的方式和侧重不同,但不是绝对割裂的,两者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sup>[8]</sup>。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是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把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上来<sup>[9]</sup>。“内涵式发展”从理念提出到政策出台,再到探索实践,是党中央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以及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对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目标和实践路径提出的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顶层设计。其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在国家政策文件中提出由来已久。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反映或符合高等教育本质要求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发展目标是使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能够更加丰富和充分地体现或实现<sup>[10]</sup>。判断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是内涵式还是外延式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创新等基本职能的发挥与实现<sup>[11]</sup>。有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以其本质属性要求及发展内在规律为驱动,以内部诸要素高效开发利用为基础,以提升发展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为目的的一种发展模式<sup>[12]</sup>。由此,本研究认为内涵式发展具体可包括“重价值、高质量、调结构、增效益、强保障、现代化”等理论要点。长期以来,部分高校对内涵式发展要求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深化,其办学动力主要源自各种外在的评价和排名,把各项指标增长表象等同于内涵式发展的本质要求,忽略高校服务供给需求的内驱力。在高等教育语境中,外延式发展与内涵式发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第一,从关注对象看,外延式发展倾向于外部规模的扩张,内涵式发展倾向于内部结构的优化与调整;第二,内涵式发展是与外延式发展相对应的一对概念,内涵式发展强调以质量或质量提升为中心的发展,不关注规模的扩张<sup>[13]</sup>。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随着国家重大战略转移,党和国家事业对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实施“双一流”建设就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坚持内涵式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同时也表明,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既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使命,也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党中央提出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具体方向和实践要求,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施教主体,必须在推动和落实内涵式发展上有更加积极的作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 (三)模式选择:从主导到协同

高校是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和组织属性,具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责任。落实办学主体责任就是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依据大学章程,推进形成有利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内外部环境。内涵式发展是一种优化内外部要素资源的过程。优化高校外部资源协同,表现为从政府宏观主导到高校、社会各种要素的优化与协调发展,实现需求与供给相匹配的多元协同共治。随着高校日益走向社会中心,其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理顺管理、办学、评价之间的运行机制,在治理现代化中重新定位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的多元关系,破解“越位”“缺



位”和“错位”等权责边界不清的问题,是优化高校外部资源协同的根本诉求与精髓所在。优化高校内部资源协同,表现为从内部治理权责不清,到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和民主管理的统筹协同,对影响学术活动的内在要素和机制进行优化与协调,实现统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兼顾学校、二级学院、学科、专业等不同层次,协同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不同环节,从高校本质属性和内在发展规律出发,着眼于内部系统的全体成员、全部领域和全部环节,激发整体效能,增强内涵式发展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协同”是一个整合性概念,有助于深化对高校内涵式发展问题的理解。协同思维和高校事业发展的有效融合能够发挥信息交汇、控制、反馈的积极作用,从而为推动新时代高校事业内涵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本文从理论联系实际出发,构建了全视域多维度的新时代高校内涵式发展内外部多元协同体系(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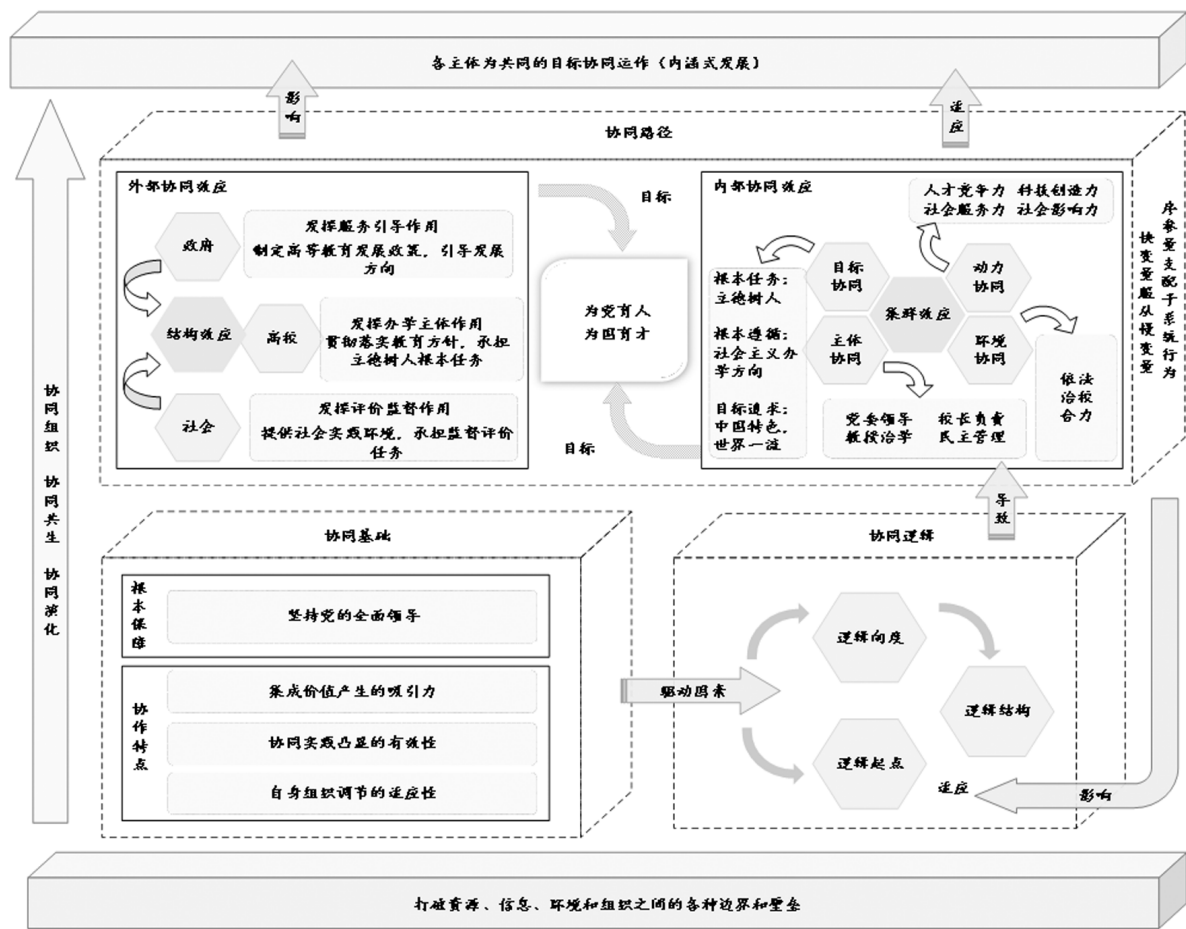


图1 新时代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多元协同体系

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转变观念,从“要素质量观”转向“系统质量观”<sup>[14]</sup>。新时代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多元协同体系,主要包括协同基础、协同逻辑和协同路径3个部分。整个协同体系运作的过程体现出自组织原理,系统要素协同组织、协同共生、协同演化,自主地从系统各主体存在边界壁垒走向多元主体为实现共同目标的协同运作,形成有控制和反馈的协同系统。在教育问题的定位上,关注教育内外部逻辑关系,关注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参与<sup>[15]</sup>。首先,协同基础是整个协同体系的思想 and 理论基石,对整个体系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其次,协同逻辑包括协同的逻辑起点(共同使命)、逻辑向度(分工与职责)和逻辑结构(联合行动),形成使命与动机、分工与职责、结构与联动的有机整

体。最后,协同路径由内部协同效应和外部协同效应两部分组成,协同目标围绕“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展开,齐心协力,相互配合。外部协同主要由系统外部子系统的序参量有机协同产生集群效应,内部协同主要指系统内部各参量交互共享产生结构效应。协同路径中体现了协同理论的伺服原理,即快变量服从慢变量,序参量支配子系统行为,使各主体为共同的目标协调运作。

## 二、新时代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协同基础

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协同基础是构建多元协同体系的思想根基和理论根源。其中,坚持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多元协同体系构建的根本保障。系统观下的协同理论是多元协同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向。

### (一)根本保障:坚持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sup>[16]</sup>内涵式发展是一种需要高校处理好内部与外部、数量与质量、规模与效益、改革与发展等关系的发展模式。从历史逻辑看,高校党的建设与事业发展从来都不是割裂的,二者在根本上具有内在一致性;从发展逻辑看,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新时代教育改革和发展中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只有加强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才能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推向前进。

坚持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把握方向是根本。“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就是在事关办学方向的问题上站稳立场。”<sup>[17]</sup>把握方向就是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认真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独立自主,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鲜明的政治方向、服务面向和育人导向。

坚持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管大局是核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sup>[18]</sup>管大局是对把握方向的进一步落实,就是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实践活动中,落实到谋划推动高校改革发展的具体事务中,充分发挥高校各级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师生、凝聚人心的作用,将高校事业发展融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履行好“四个服务”的具体要求。

坚持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做决策是关键。高校党组织是高校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组织者和实践者,加强党的领导最重要一环是善于做决策。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全体师生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需要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政治功能,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号召力,汇聚推进高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坚持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保落实是保障。实干兴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保落实重点在“保”,抓调研谋划、抓落实推进、抓监督检查,要善于从作风建设上下功夫。要围绕干部作风建设、师德师风建设、校风学风建设等方面,将党建与教育教学管理的各环节有机融合,努力把高校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高校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真正将党建工作落到实处、做到深处。

### (二)实践方向:基于系统观的协同路径选择

高校作为社会子系统,运用系统观的思维方式,有利于实现对高校内外要素和结构的整体性考察,构建多元协同体系是深入推进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实践方向。

### 1. 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为高校内涵式发展提供基本的思维方式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普遍联系是指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各部分、各要素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有机整体。普遍联系的事物组成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又因为普遍联系的程度和层次不同,区分为无数子系统。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所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的属性和功能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相加,系统内部各要素合理搭配,协调一致发挥多元整体效能,产生“互补”效应,否则就产生“内耗”。尊重系统观的思维方式,就是坚持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综合。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协同体系构建,要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基本理论与高校发展实际相结合。

### 2. 现代系统论为高校内涵式发展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撑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事物和过程组成的具有整体功能和综合行为的统一体<sup>[19]</sup>。整体性是系统论的最显著特性,是系统思想的灵魂。系统的整体功能不仅包括各部分的功能,还包括由各部分相互联系形成结构而产生的新功能。对于系统的分析和认识,一般包括系统的要素分析、特征分析、环境分析、目标分析和结构分析。高校这一子系统包括特定的系统要素、系统结构、系统目标和系统环境,深入推进高校内涵式发展,若不能借用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来认识改革,往往会出现偏差和失误。因此,立足系统论的思维来认识和考察高校内涵式发展才能做到整体性与有序性的统一。考察高校内涵式发展,需要从高校系统的基本范畴出发,将高校分为内外两个子系统。在外部系统中,高校内涵式发展可以看作是政府、高校和社会等多元主体,过程及环境等要素中的有序融合;在内部系统中,高校内涵式发展可以看作是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根本任务,在目标、动力和环境等要素中实现内部功能优化。

### 3. 构建多元协同体系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实践方向

协同理论是系统论的重要分支理论,其核心理念是在一个有效整体中致力于协同的目标价值诉求,通过形成共享思维,构建协调机制来激活新的整体效能。协同“是指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的联合作用及集体行为,结果是产生宏观尺度上的结构和功能”<sup>[20]</sup>。因此,协同是致力于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sup>[21]</sup>。多元性和目标性是协同的典型特征。从组织的内外要素关系来看,协同一方面指一个组织内部各要素的协调一致,互相配合,实现组织目标;另一方面指各组织之间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任务而互相配合,形成一个任务完成的有机整体<sup>[22]</sup>。协同即齐心协力、互相配合,指通过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通力配合形成整体的运行合力,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协同的本质是打破资源、信息、环境和组织之间的各种边界和壁垒<sup>[23]</sup>。多元协同之所以能够成为推动内涵式发展的整体性概念,一是在于集成价值产生的吸引力。协同揭示了开放复杂系统在外参量驱动和内部子系统协同作用下,以自组织方式在宏观尺度上形成空间、时间或功能有序结构的条件、动力以及演化的规律。二是在于社会实践凸显的有效性。从一般方法看,协同运用的是综合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从总体上把握对象,重点研究系统中各部分如何协调、协作和协同产生的统一结构。三是在于自身组织调节的适应性。协同是对资源和相关要素的有效汇聚、整合或流动,从而共享资源,减少重复,提高效率。这是由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多主体性、多环节性、多领域性决定的。因此,构建多元协同体系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有利于促使高校在参与主体、价值目标、动力源泉、资源配置等要素融合中实现科学的可持续发展。

## 三、新时代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协同逻辑

“高校运行的规律是高校内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sup>[24]</sup>协同能促进学校深化教学改



革,显著提升人才的培养质量,并能形成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协同模式<sup>[25]</sup>。因此,高校是否遵循自身发展规律来办学治校,不仅取决于内外部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取决于多元主体基于怎样的逻辑起点、逻辑向度和逻辑结构进行协同演化、协同共生和协同组织。

### (一)逻辑起点: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平衡

在高等教育外延式发展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政府的外力驱动<sup>[26]</sup>。从外部系统看,社会自组织系统的治理是基于信任机制与互利原则的协调。因此,高校外部组织的协同逻辑,源于各利益相关者主体间的权力配置与制约,在于其组织制度与机制的内在关系安排。长期以来,高校外部多元主体利益诉求不够平衡,表现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权责边界不够清晰;社会组织参与教育评价、教育质量认证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有待进一步提高;高校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有效衔接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厘清高等教育领域“管”“办”“评”以及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高校外部多元协同体系,从各利益相关者角度探寻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实现“政府宏观管理”“学校办学”与“社会评价”的有序运行机制,是高校外部多元协同体系的逻辑起点。

从内部系统看,高校内部存在党委领导下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长期以来,因内部各部门与各院系之间资源配置不易均衡等因素导致决策不够科学,进而出现个别高校追求专业规模数量的扩张,发展类型趋同化、办学特色不够鲜明、层次不够分明和结构不够合理等现象,使高校的发展停留在局部而非全局、表象而非本质、个体而非整体、零碎而非系统的发展格局,还没能从其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律出发探索如何增强发展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教育的体制机制、内容方式、发展模式与路径都在发生变革。为适应数字经济和智能时代的需要,顺应大数据发展的潮流,更充分地发挥高校的功能与作用,更新观念、丰富内容、改进方法、提升效率成为内涵式发展的时代选择。因此,推进高校内涵式发展,就要着眼于高校内部多元权力主体协同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着眼于党委统一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和民主管理相协调,以参与主体为基点,以协同的观念重构与系统再造为目标,通过完善体系对内涵式发展进行系统创新、过程再造和有效变革。以协同育人为根基,准确把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内部系统中形成一体与多元、分工与合作、教学与科研、行政与学术、结构与功能等统筹协调,致力于构建体系完善、机构健全、运转科学、发展协同且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新格局。

### (二)逻辑向度: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

从外部系统看,高校多元协同包含了由“单向管理”转向“多元协同”和由“人治与管治”转向“法治与共治”的逻辑。高校外部协同的逻辑向度蕴含着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一是由“单向管理”转向“多元协同”。事实表明,单向度的“一元”管理易导致权力分配出现不够均衡现象,带来管理结构不够有序,“多元协同”的价值取向能实现政府行政管理权、高校自主权和社会参与权的相对分离和相互制约。二是由“人治与管治”转向“法治与共治”。在传统意义上,中国高校的依附性强,遵循自身发展规律不足,且外部协同主体参与办学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在依法治教理念下,规范有效的协同程序能实现主体间相互制约、运转协调和持续互动,让“法治与共治”日益成为外部多元主体协同的逻辑取向。

从内部系统看,高校内部多元协同表现为统筹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的关系。尤其是在推进“双一流”建设中,“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是其中重要任务之一,它包括内部各权力主体、各组织机构之间的权责界限,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确立“四位一体”的协同共治结构。同时,内部多元协同还表现为履行高校职责职能,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整体性和系统

性为特点,统筹不同层次,兼顾不同环节的全局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功能实现。

### (三)逻辑结构:多元要素之间的协同共生

基于系统论视角,高校外部多元协同体系包括主体协同、过程协同、环境协同等基本要素,各系统要素有机融合形成高校外部多元协同的逻辑结构。一是主体协同。外部协同的本质在于主体的多元性和权益体系的规约性。如何使众多主体形成有机互动的整体系统,建立合作制约的多元协同机制,是事关高校有效运行的关键。二是过程协同。任何事物的运行如果没有正当程序的保障,都会丧失运行的有序性和规范性。注重过程协同的程序完善,是高校外部协同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的基本保障。三是环境协同。高校外部协同需以环境塑造为依托,置身于社会环境之中,寻求与政府、社会之间共享互动的政策保障,建立激励监督的运行机制,形成共治文化。主体协同、过程协同与环境协同的多维立体结构,形成高校外部协同的内在逻辑结构。

从结构体系看,高校内部多元协同体系包括目标协同、主体协同、动力协同和环境协同等基本要素,各系统要素有机融合形成高校内部多元协同的逻辑结构。一是目标协同。包括在整体发展战略设计上,立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确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总体目标,做到战略目标与具体目标的统一,长远规划与阶段性发展的统一,总体规划与具体任务的统一,从不同维度、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实现思想与行动统一到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上。二是主体协同。包括高校内部“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之间关系的调节和规范,力求在高校内部权益相关者的关系结构中形成在权力、责任及利益上的相互协同与合作,从而推动高校办学治校目标的实现。三是动力协同。高校内涵式发展内在动力来源于高校自身发展规律和本质属性规定的内驱力,包括方向引领力、人才竞争力和科研创新力,外在动力来源于高校满足“四个服务”规定的外显力,包括社会服务力和文化影响力。四是环境协同。高校内涵式发展多元协同体系需要具有执行力的环境作为保障,其核心在于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环境协同体系,主要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大学章程和相关制度,实现对内部结构、利益主体、职责权限等进行规范,促使整体组织架构和功能体系实现优化与高效。

## 四、新时代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多元协同路径是贯彻系统观,从整体性出发优化内外部要素、结构与功能的必由之路,有利于实现内涵式发展从点的突破到面的积累,从具体工作提升到治理体系创新发展。

### (一)外部协同效应:提升政府、高校和社会协同的集群效应

以多元协同为核心理念,强调政府在办学中的宏观管理、调控和服务作用,强化高校在办学中的主体作用,保障社会在办学监督中的评价作用,厘清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的新型治理关系,完善高校外部多元协同体系是推进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 1. 主体协同: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办学

针对高校办学实际逐步建立政府与高校的新型关系,推进高校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办学,确保外部协同保障机制的完善。政府应以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为契机,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主动扮演经费投入者、关系协调者和治理监督者的角色<sup>[2]</sup>。应以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为契机,建设社会监督评价机构,建立健全评价制度,完善监督评价反馈机制。在依法治教的场域下依靠立法推动外部协同进程,明确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的权责利关系,确保高校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办学利益诉求的实现,为高校逐渐走向社会的中心奠定坚实基础,为高校创新发展寻求多元平台。

#### 2. 过程协同:多元主体运行的权益制约

高校外部协同权益合理配置的关键在于程序公正,推进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



以及外部主体间权益的科学运行。一是优化高校与政府之间的过程协同。应依法明确政府对高校的相关权利与义务,建立政府治理的适切程序,构建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协同新生态;二是构建起政府、高校和社会的共治模式。由于多元主体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厘清过程协同关键在于多元主体间权益关系的平衡,实现外部协同权力的科学配置,并通过立法保障各主体间建立科学、规范的外部协同机制,充分彰显程序正义原则、规范办学原则和依法行政原则。

### 3. 环境协同:彰显共享互动与激励监督的有机结合

协同理论表明,各主体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有效协同的核心。协同体系是一个随组织内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生态系统,协同组织内外部各要素之间的互动融合,是随着创新需要的变化发展而进行的,通过新关系的建立、新功能的拓展实现自身在时间和空间变化中的可持续发展。高校外部协同实现多元主体共享、互动、互助的转变,根本在于政策环境的保障与支持。监督环境是高校外部多元协同权力制约的有效保障。长期以来,高校与政府的监督关系是单向度的,且监督机制单一,尚未形成共治理念,推进协同共治亟待明确高校外部协同各权益相关者间的制约关系,形成纵向与横向的监督机制。文化环境是高校外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执行力彰显的精神灵魂。我国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着重强调要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健全内外部协同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制度文件。高校外部协同应兼顾制度维度和文化维度。高校外部多元主体协同应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促进过程协同达成共识,建立具有高度认可度的规章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达到“以文化治”的良好境界,全方位推动高校迈向内涵式发展新阶段。

## (二) 内部协同效应:提升目标协同、主体协同、动力协同和环境协同的结构效应

在高校内部系统,内涵式发展体现为内外部各种要素和机制的优化与协调发展,构建目标协同、主体协同、动力协同和环境协同的多元协同体系,充分激发高校内在发展潜力。

### 1. 目标协同:确保办学方向与办学质量的内在统一

一是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与立德树人的内在统一。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阐明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党的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本质特征和鲜亮底色,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从本质上回答了高校的基本属性与功能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明确了谋划推进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二是结构合理性与功能有效性的内在统一。新时代高校内涵式发展应遵循内在结构合理性与外在功能有效性的有机统一,在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引领下,促进高校办学质量在结构与功能层面的综合性整体提升,加速推进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加强教学体系、学科体系、专业体系、管理体系建设,以前瞻性、战略性眼光推进高质量人才培养系统工程。

### 2. 主体协同:确保内部多元权益生态平衡

各主体要明确在协同体系中的责任边界,各司其职,积极参与到治理中。高校内部行政力量源自高校外部政府主导的驱动力,与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要求具有一致性。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高校内部的基本权益结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框架。在这一制度框架下,通过其议事规则和集体决策程序,党委履行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校长在党委领导下行使规定的各项职权,组织履行高校的各项职能。

一是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协同。健全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承担起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主体责任,完善民主管理和学术治理<sup>[27]</sup>。高校作为具有特定职能的学术性社会组织,必须遵循以知识

的继承与创新为目标的协同共治。因此,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协同,关键在落实教授治学和教师参与办学。强化教授治学,需完善学术事务议事规则,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在高校学术事务治理中的话语权。强化教师参与办学,需充分调动教师参与办学治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以教学团队、学科团队及科研团队等为代表的基层学术组织的办学话语权。

二是校院两级内部管理协同。机关集权、管理重心太高,使二级院系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得不到有效调动,导致二级院系缺乏创新<sup>[28]</sup>。二级院系是实施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任务的基本载体,是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动力源和发力点。推进行政管理重心下移,要明晰校院两级关系权责,积极推进从“学校办大学”到“学院办大学”,以遵循高校内在的特点和规律,激发学院办学主体性,彰显学术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实现有效约束与高效激励。

三是高校民主管治与广泛监督的协同。高校内部多元协同涉及教师、学生、管理者等各利益相关者,坚持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共治的原则,有利于充分调动师生参与办学治校的能动性,凝聚改革创新的共识,汇聚改革发展内生动力。合理解决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理事会和校友会以及群团组织等在多元主体间形成共治的利益诉求,构建参与度高的协同机制,破解内涵式发展难题,最大限度汇聚协同共治合力。

### 3. 动力协同:确保办学内驱力与外显力的双向共生

高校内部多元协同的动力源于内外“双重属性”,一方面是以人才竞争力和科研创新力为内核的办学内驱力,另一方面是以文化影响力和社会服务力为外核的办学外显力,二者协同共进、双向共生,共同形成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双轮驱动力。

提升人才培养竞争力是高校办学内驱力的根本体现。高校内涵式发展是以高校本质属性要求及发展内在规律为驱动的,提升人才培养竞争力是高校最根本的立足点和基本功能。高校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回归自主办学的本体价值,必须将提升人才培养竞争力作为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培养人的过程中以促进人才素质提升为目标任务,以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诉求,以高素质的人才输出助力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提升。提升人才竞争力需注重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注重育人资源有效集成,注重全方位、多层次、各领域的高质量育人体系建设的系统推进,注重基础研究人才与创新创业人才培育的统筹,进一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的综合素质与核心竞争力。

提升科研创新力是高校办学内驱力的基本内核。高校是特殊的学术组织机构,其内驱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于学术研究创新,学术权力是其固有的特殊本质和基本内核。提升学术生长力是高校的根本属性,为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和社会服务提供基础。科研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高校要聚焦国家战略需要,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动力。瞄准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卡脖子”问题,打破院系、学科和专业的阻隔,推动跨部门、跨学院和跨学科的协同,鼓励交叉融合、协同攻关和集成攻关,为国家加快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真正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更好地发挥高校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应用研究重要方面军的作用,进而通过科研创新不断发现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

提升文化影响力是高校办学外显力的价值引领体现。高校作为文化的继承、传播、创新和研究者,在社会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功能。高校是具有育人功能与文化传承创新功能的内在统一,外显力的实现通过内驱力而起作用,“两者统一于育人的实践,统一于高校的本质属性”<sup>[29]</sup>。提升文化影响力是高校办学外显力的价值引领体现,其动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高校的文化价值引领力表现为文化传播、文化整合、文化创新和文化引领;

另一方面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主要以高等教育育人功能的实现作为载体,提升社会公众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提升高校的文化影响力,不仅需要全方位营造优良校园文化,注重校风学风、办学声誉的培育和传承,发挥其对学生成长成才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要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彰显高校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引领力。

提升社会服务力是高校办学外显力的供给能力体现。事物的发展总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在高校内涵式发展动力的分析中,内驱力是高校自主办学的内在依据,外因则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外部需求。社会服务是大学不断走向社会中心的基本职责,高等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科技体系、社会体系的有机衔接,提升高校社会服务,要求不断推进产教协同,以产业转型发展和技术改革升级为需求,优化人才培养的新定位和新要求,全面提高学科专业设置、人才供给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契合度。提升高校社会服务力,要求不断推进科教协同,建立健全创新技术转化机制,汇聚创新资源,优化学科结构、专业布局,建立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全方位服务和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确保社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 4. 环境协同:确保大学章程与制度体系的依法治校合力

大学章程是确保高校内涵式发展有效运行的关键。高校内部多元协同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大学章程的制定与执行,这是实现内部协同的规范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同时能够突破高校学科与行业的壁垒,实现资源共享,推动体制改革深化。一是大学章程明确了内部各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围绕党委与校长、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校院两级管理、学校与师生的多元主体,规定了高校的组织机构以及各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二是大学章程明确了办学治校的法律依据,围绕办学环境资源的协同,探索办学资源利用方式,提升有效办学资源存量,提高潜在办学资源开发增量。大学章程明确了高校内部协同的基本范畴,形成了法律规定的内部关系协同机制,能有效确保高校办学治校的规范运行和高水平发展。

制度建设是确保高校内涵式发展规范运行的保障。制度是保障要素,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维持社会良性运转的规范。高校内涵式发展需要具有整体性、层次性、统一性、适应性和有效性的制度体系保驾护航。一是完善高校的独立法人制度,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章程确保自主办学的法人地位,明确办学的独立法人资格;二是重视大学章程统领下的内部管理制度完善,建立与高校内涵式发展相匹配的制度体系,增强内部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形成有利于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环境保障力。

## 五、结 语

新时代高校内涵式发展实践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党建引领恰恰在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始终把党建引领贯穿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在整体统筹、综合研判、系统集成、协同联动的引领统揽作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推进高校内涵式发展,就是要坚持大局观念,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强化系统观念,促进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更加协调,更加适应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要不断构建系统思维,遵循高等教育本质属性和内在发展规律,协同统筹高校外部多元要素资源,系统优化各要素结构与功能,处理好教育治理体系中要素与系统、内部与外部、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关系,通过党建引领凝聚各方力量,整体设计又分类指导,既有整体统一性规范,又有个性化



发展空间。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内涵式发展有别于外延式发展,要聚焦影响教育活力、质量和公平的顽瘴痼疾,在更新观念、丰富内容、改进方法、提升效率等关键问题上,不断优化教育治理体系。要不断健全生态观念,以内涵式发展的整体性、适应性和支撑性特征为牵引,不断激发和调动政府、学校和社会多元共治活力,加强管理,优化治理,充分激发高校内在发展潜力,在其内部系统中,构建目标、主体、动力和环境协同的多元协同体系,不断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赋予高校更多办学自主的权益,进一步促进管、办、评分离又协同的体系改革,不断完善教育治理体系,促进高校事业的协调、高效和可持续发展。要不断坚持面向未来,引导高校和教育工作者更新教育观念,为教育全面赋能,重塑教育未来,引导社会各界更加关心支持高等教育。

总之,高校内涵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大使命,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和现实需要。新时代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多元协同体系,是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形成的多元协同演化生态,是高校内外协同创新路径的探索,为推动基于价值理性的教育现代化、不断激发新时代高校内外部治理活力助力赋能。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3(02).
- [2] 史秋衡,吴雪,王爱萍,等.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2.
- [3] 陈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意蕴、现实境遇与推进策略[J].重庆高教研究,2022,10(1):3445.
- [4] 阿马蒂亚·森.从增长到发展[M].刘民权,夏庆杰,王小林,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
- [5] 马陆亭.教育体系是当前推动教育制度成熟定型的工作抓手[J].中国高等教育,2020(7):3032.
- [6] 别敦荣.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J].中国高教研究,2018(6):614.
- [7] 刘齐,张睦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百年发展[J].重庆高教研究,2021,9(1):1224.
- [8] 沈刘峡,周忠林,郝培文,等.基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构建[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8):2425.
- [9] 刘贵芹.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J].重庆高教研究,2013,1(1):44.
- [10] 石中英.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理论要义与实践要求[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9):715.
- [11] 张德祥,林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本质的历史变迁与当代意蕴[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11):38.
- [12] 睦依凡.大学内涵式发展:关于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路径选择的思考[J].江苏高教,2021(10):1221.
- [13] 郑文龙,欧阳光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挑战与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22(6):4653.
- [14] 刘振天,俞兆达.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质量革命:观念转变与行动路线[J].高等教育研究,2021,42(4):414.
- [15] 周元宽,鲁沛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逻辑理路和实践取向[J].重庆高教研究,2022,10(4):4959.
- [16] 习近平就高校党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立德树人思想引领 加强改进高校党建工作[J].教育现代化,2014,2(2):54.
- [17] 教育部课题组.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36.
- [18]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J].中国高等教育,2016,577(24):57.
- [19] 赵文华.高等教育系统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
- [20] 赫尔曼·哈肯.协同学[M].凌复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
- [21] 陈劲.协同创新[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33.
- [22] 俞建光.协同创新模式下高校校企文化融合的路径与功能探析[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4):8386,124.
- [23] 李晓明.培育协同文化提升大学科技园创新绩效[J].中国高等教育,2014(18):2326.
- [24] 睦依凡.关于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创新研究的框架性思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8(12):2432.
- [25] 刘宴兵.以协同创新促进信息人才培养[N].光明日报,20120711(16).

- [26] 王新清.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8(5):1423.
- [27] 周海涛, 景安磊, 刘永林. 增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能力[J]. 教育研究, 2018, 39(4):6267.
- [28] 黄琦. 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思考[J]. 中国高等教育, 2010(22):1517.
- [29] 李梁. 高校文化传承创新与高等教育功能的耦合及其进路[J]. 思想理论教育, 2013(11):4447.

(编辑:杨慷慨 校对:王茂建)

## Research on the Multi-Collaborative System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YUAN Aiyuan<sup>1,2</sup>, WU Linsheng<sup>2</sup>, LIU Yanbing<sup>3</sup>

(1.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2. Medical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16, China;

3. Chongqing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As the leading sector of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is at the jun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first productive force, talents as the first resource, and innovation as the first driving force. Its development level reflects a country'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 major mission of the new journe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choice and practical nee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model in the new era. It is updated iteratively, enriched in content, improved in methods, and improved in efficiency with the constant change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times. Thinking about how to build an innovative system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is not only required by the era and practice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but also follows the logic that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s an organic whole. The innovation system can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based on value rationality and meet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further stimulat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system of universities. "Collaboration" is an integrated concept,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system for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ntegration of collaborative think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ll help to give play to the positive value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control and feedback.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s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llaborative system, and take breaking all kinds of boundaries and barriers between resources,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organization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form an evolutionary ecology of multiple synergy for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build a development model that takes improv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nerg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path,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reform practice refere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for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governanc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ltivariate collaboration